

(接上頁)《中國科學報》:請大致介紹下您這些年是如何工作,到了哪些地方,參考了多少文獻?

李兆良:為查考證據,我到過很多地方。

梵蒂岡的地圖畫廊,繪製建造是利瑪竇來華時代,里面有當時的意大利地圖,大概四米寬,比《坤輿萬國全圖》中有關意大利的內容準確得多。佛羅倫薩是1400年歐洲文藝復興的重地,西班牙巴塞羅那有紀念哥倫布的海洋博物館,《坤輿萬國全圖》中都沒有標示這些重要地名。甚至連利瑪竇出發前拜會過的梵蒂岡也沒有。

在美國,我到過原住民的保留區,包括西部Navajo,東部Cherokee,Catawba保留區,還有阿拉斯加。去過各地的博物館,佛羅里達西班牙人首次登陸的地方,法國在前美國的殖民地,英國在美洲的第一個殖民地吉姆斯頓,美國原住民博物館等大大小小的博物館,不可勝數。英國牛津大學的博物館也保留了美洲原住民的文物,

《中國科學報》:為了考證,您比較了600多份地圖,很難想象其難度。相信您參考的文獻也無法計算。

李兆良:到現在為止,我查考的地圖已經早超過600份,不過很多是重複的——都是抄襲之作,變動很小,所以不需要每一份都仔細研究,主要集中與《坤輿萬國全圖》先後同期的。

至於我翻查了多少中外文獻的確難以計算,少說也有幾千種,包括中國與西方古籍的影印本,各地地理圖片、視頻、古地圖。

好在這些工作大部分在電腦上完成。互聯網對我的研究有很大幫助,十年工作是相當高效的。一小時的工作可超過跑一個月的圖書館。

谷歌“地球”讓我能須臾之間馳騁各大洲,分辨率猶如置身其境。實地考察的旅行時間完全省去,可以在網上搜索圖片、視頻。所有旅遊者拍攝的實地地理,讓我不需要跋涉取得證據。他們沒有偏見地拍下來的,我可以選擇最佳的效果。這些旅遊者成爲我的無形助手。

我不信任第二手資料,能找到第一手的,儘量用第一手的。

特別要提的是利瑪竇的《中國札記》,我參考了1615年和1616年的拉丁文版、1616年法文版、1621年西班牙文版、1622年意大利文版,1953年英文版和1983年中文版。

有意思的是,利瑪竇的原作是意大利文,卻出版晚于其他歐洲版本,在拉丁文版至意大利文版之間的七年內,有關方面肯定對翻譯有過激烈的爭論,最後還是出版了原來的意大利文版本,應該是最接近原作者意思的。其他版本是按照傳教士金尼閣的拉丁文翻譯的,無疑是有出入的。英文版是300年後翻譯出版的,譯者對原文意譯,不止歪曲了原意,而且出現

重大錯誤,中譯本是根據英譯本翻的,也繼承了錯誤,導致對整段歷史闡釋錯誤。

對於這段翻譯史上最嚴重的錯誤澄清,我已經寫成論文,將要發表。

《中國科學報》:收錄在《武備志》里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後人多簡稱爲《鄭和航海圖》,似乎沒在您的比較之列?

李兆良:中國的地圖至少有三種。一是大家普遍看到的,給地方官員用的,主要顯示地方政府之間與中央的關係;一種是《武備志》里的航海圖,供船員辨認經過的城市、里數、航標,這種地圖對我的研究幫助不大;另一種就是給皇帝、高級大臣做戰略部署用的大型地圖,如《坤輿萬國全圖》。《坤輿萬國全圖》的形式是鄭和大航海之後才出現的珍稀地圖,與別的不同,因此就被認爲不是中國人自己的作品。事實正相反,西方的世界地圖得自中國的地圖信息。

非歷史學科班出身,沒有任何成見包袱,可以從全新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從源頭去追查答案

《中國科學報》:在考證的過程最困難的是什麼?

李兆良:我的考證過程可以說很順利,有時候順利得神奇。平常對事物多方面、多領域的信息關注、交叉思考。所謂“靈機一觸”不過是散落佈置的棋子連成線面,幾千片拼圖板塊整合成型,水到渠成而已。

如果說不順利,倒不是考證過程,而是被國人接受的過程。更正600年世界史的這一大事件,最大的反對聲音來自中國學界。

反對者不斷在中國文獻里找我學說的問題,卻不從外國文獻里找問題,有人斷章取義,盲人摸象,抓住一兩點,根本沒有數據支持。

我粗略地分析了一下,反對者大概有幾種情形:

1.受過去教育影響。全盤接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教育。

2.一些學者覺得問題太大,“不敢爲天下先”。

3.一些學者不願意拋棄過去幾十年持的理論,寧可照本宣科,也不更正。

4.過去有些外國學者提出鄭和船隊到美洲,但是證據不足,或者誤釋,被攻擊、嘲笑。有些人就想當然地把我當成一夥,把他們的錯誤轉嫁我身上。

5.一些人認爲這是600年以前的事,沒有現實意義。

我認爲,科學真理的檢驗標準是數據與事理分析,是非對錯,不應以人的出身背景、國籍、性別爲標準。因循守舊的結果使得很多重大歷史錯誤不能及時更正。

比如在一些認知里,所有在中國種植的美洲作物都被認爲是西班牙、葡萄牙人帶來的。誰帶來?什麼年代?原文獻哪里記載?沒有人

問。事實上,這些美洲作物首先出現在中國西南邊陲地方,那時哥倫布還沒有出生,歐洲人還不懂得怎樣吃,他們如何萬里迢迢帶來中國做商品?滇-印-緬-泰-越的茶馬道應該是鄭和帶回美洲作物的重要途徑之一。

《中國科學報》:對於質疑,您是怎么看的?

李兆良:我在書里開宗明義說過,假如讀者對我的理論覺得不對,能提出反對意見,一定做過一番功夫,那我寫書的目的就達到了。有確實的材料,我樂意更正我的理論。

科學是永遠的進行時態,沒有止境。所有理論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搭建的。我提出的新說,目前爲止,所有的文獻、地圖、文物、文化遺存的觀察均能互證,而西方的地圖學歷史滿是漏洞,不堪一擊的。

愛因斯坦說,做多少實驗都不能證明一項理論,但是一項實驗顯示錯誤,就足以推翻整套理論。所以反證是最重要的。要推翻我的論說,也要提出支持西方學說的證據。

西方地圖學,從16世紀開始,一直在掩飾錯誤。以前沒有互聯網,大家沒有足夠的資訊來源去破解,現在事實和推理擺在眼前,不能再以錯補錯。

《中國科學報》:歷史學者毛佩琦提出了一些問題,如“鄭和的費信、馬歡,在他們的航海實錄《星槎勝覽》《瀛涯盛覽》中爲什麼對此只字不提?”您是怎么考慮的?除了考證地名,還有其他佐證的資料嗎?

李兆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鄭和大航海文獻極爲稀罕,大部分被毀,或者在明清民國間被盜運到西方。西方的中國材料其實很豐富、很重要,可惜被認爲是西方的成果。這些珍貴的大地圖,很多是孤本,到了外國,翻譯後再返回來,被錯認爲是外國文獻、西方人的成果。

事實上,明清交際,許多明代的重要文獻流入西方,再從西方返回,被誤會以爲是西方的作品。傳教士、漢學家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屬這種情況。

《殊域周咨錄》是萬曆二年(1573年)刊行的,里面提到鄭和時代的文獻被毀掉,萬曆皇帝應該知道這件事。鄭和時代測繪的《坤輿萬國全圖》不可能再出現在皇帝面前,不然有人要頂欺君之罪。

官員們藉口利瑪竇從外國帶來地圖作爲保存地圖資料的做法是不得已的,絕對不能寫進任何典籍內,這不會有文獻核實,只能猜測推理。

宣德時代到達西半球的明代人,已經不能回來,無法把他們的見聞留下來。後來與當地人同化,歐洲人殖民美洲,消滅了95%以上的原住民,包括明代中國人的後裔,他們被強迫用英語,原住民的文化歷史已經被清除殆盡,我們只能從蛛絲馬迹去探求,我在《宣德金牌啓示錄:明代開拓美洲》一書里有比較詳細

的論述。

對於利瑪竇與李之藻均沒有參與測繪《坤輿萬國全圖》一事,只有摹抄,加地名,可以在利瑪竇的《中國札記》查到證據,裏面很明顯的述說,但是在翻譯過程被誤解,或者說有意略掉。就是前面提到的,以當事人利瑪竇自己的說法證明他不是作者,相信很難反對吧?

《中國科學報》:似乎學術界不大提誰先到美洲的問題,這是因爲學院出身的歷史學者和您的思路不一樣?

李兆良:中國學者能獲得的資料是有一定局限的。我的證據包括地圖、歐洲文字的原文獻、地理、文物,不少是谷歌旗下的網站提供的,這些技術在過去十年間才具備,剛好是我研究的時段。

西方16世紀的文獻比較難懂,16-17世紀的英文文法,拼寫與今天有很大分別。除非很熟悉,否則搜索是很困難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意大利、拉丁等文字就更不好說了。不能掌握原材料,靠重重翻譯,錯上加錯的演繹,無法得到真相。

我不是歷史學科班出身,好處是沒有任何成見包袱,可以從全新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從源頭去追查答案。我不是單單看文獻,而是科學地分析文獻有沒有道理,從無字處讀書。真理離不開真相,真相不會違反常理、推理。

再以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爲例,衛匡國假如在9年內測繪中國6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使每天工作24小時,每小時也要測量76平方公里,不要說騎馬在地面測,用飛機也看不完。就像所謂的外國傳教士10年內測繪《康熙皇輿全覽圖》其實是在明代地圖的基礎上作若干增補而已。

可以推測出,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是把中國歷代測繪,明代總其成的地圖集翻譯成西方文字。而這部地圖集有明確經緯度,用球形投影繪製成,所以可以說,假如不是中國創建近代地圖學,起碼是中國獨立建立的,並非過去認爲的來自西方。事實上,我已經查到把中國的地圖知識傳到西方的人物與時期,也將發表文章。

毛佩琦教授說得好:“跨一步,將石破天驚”。對我來說,這一步已經不是下臨深淵,而是踏踏實實的平地,當然,繼續鋪磚還是需要的。

這項研究,從好奇出發,經過科學分析,得到的結果,是出乎意料的,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推翻600年的世界史。假如這項研究的成就是推翻西方中心論的世界史、航海史、文明史,那只是授人以魚,更重要是授人以漁,激發科學思維在人文學科的應用,啓發獨立思維,不因循,不盲從,這是終極目的。

還原、更正世界史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需要更多人參與。讓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歷史有更深的瞭解、自信,增強世界華人的凝聚力,擴大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思維,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利瑪竇究竟怎麼說?

坤輿萬國全圖與利瑪竇扎記考疑摘要 ——李兆良

版本前,我也引用過中譯本的材料。6平方英尺與現存《坤輿萬國全圖》的72平方英尺有巨大差異,是引起我發掘原文獻的原因,想不到帶來更大的發現。

ptā, quantum per publica negotia licet, aſſequeretur. Primum eius in hoc genere opus fuit, hanc vniuersitatem faciem, quam maximis posset finibus explicare. nam cum ita excedit, vt in quadrū viri altitudinem ſuperaret: Eam Sinens, ut alibi diſum est, more eleganter complicant, & cum volū explicitant, valuis quibusdam lignis affabre concinnatam: recudendū opus auxit P. Matthæus Regnis, locis, notis, ad margines de ſole, ſtellis, alijsq; in quibus orbis Christiani fides ac mores coaptata locorum occatione ſcribantur. Huic operi varia literatorū proēmata ſplendorē addiderunt. Hætabulæ cum artificib; ſculperentur, clara incisj noſtris duplices tabulas exararunt, atq; ita bis, vno tempore prodijt opus gratissimum: quod etiam nondum ſatis fuit ad emptorū vota explenda: vnde alius quoq; Neophytus tabulis octo maioriō vniuersi amplitudinē coarctauit, atq; ita iam tertio in hac Regia ſpectare caput. Nec alias Mathematicarum diſcipularum partes Leo reliquit intactas, quin potius ſtruendis machinis

præcetti della Cosmografia. Primieramente in questo genere fu necessario di ſpandere la faccia della terra con quelli maggiori confini, che poteſſe, e però l'impreſſe in una forma in quadrato, che auanza la forma d'un'uomo. Queſte tauole all'yan-za della China le piegano molto acomodatamente, e quando vogliono, e ſtriegano con alcune fineſte di legno affai bene a queſto propofito acomodate. Quando ſi riſtampon, il P. Matteo vi aggiunge alcuni Regni, daci, e ſegni al margine, con note del Sole, delle Stelle, e d'altre cose; là oue opportunamente, ſecondo il luogo ſcriueua della fede e de' costumi della Religione Cribifiana. Diedero a queſt'opera grande ſplendore i vari poemi di persone letterate. Queste tauole eſſendo intagliate da gli artifici, e ſenza ſaputa noſtra ne fecero due copie, e coſi ci ſuora due volte, opeſſa molto grata, il che non baſſo per dar ſodisfazione al deſiderio de' conſervatori; in maniera che un'altro Neofito in otto tauole maggiori reſtrinje l'ampliezza uniuersale della terra. Si che tre volte fu ſeduta l'opera in Nanchino ſtamponata. Anco volte inviarare l'altra parti delle diſcipline Matematiche. Egli gran parte diuorò dell'opera Geometrica

在黃河、淮河。明初,黃河水患頻頻(見《黃河改道與地圖斷代》一文)。意大利版明確說是因爲洪水翻船,刻板被沖走的。當時刻板最好是揚州,地圖本來是在南方刻版的,原藏南京。假如利瑪竇到了北京才認識李之藻(李我存),地圖在北京繪製,爲什麼要把地圖送到千里以外的南方刻板?拼合不同的地圖,校訂經緯度,是一宗非常艱巨的工作,本來就不可能在一年多一點的業餘時間完成,還有翻譯,校對,寫序文,再送到千里以外的南方刻板,多花大半年功夫,時間上根本不允許。

利瑪竇從來沒有見過萬曆皇帝,只是通過官員們轉達。官員告訴他,皇帝要的是六幅的地圖。爲什麼這么巧,九年前(萬曆癸巳,1593年)南京吏部梁軻的《乾坤萬國全圖》也提到六幅的世界地圖?《乾坤萬國全圖》上標注“加拿大”,“亞

伯爾耕”的美洲地名,卻沒有利瑪竇認爲最重要的美洲地名“亞墨利加”。所以,本來南京的《坤輿萬國全圖》原圖就是六幅的地圖,沒有利瑪竇加的地名,鄭和時代中國人認識的西半球地名是加拿大,亞伯爾耕。梁軻的地圖也提到利瑪竇,但是當時的利瑪竇沒有任何影響力在中國刻印的地圖上添加什么信息,他到南京不久就被驅逐到江西南昌,後來第一次上北京也是馬上被趕走。

鄭和大航海到西半球的時候,正是紫禁城大興土木的時候,1421年才建成。主要的政治中心仍然是南京(南直隸),所以鄭和時代的《坤輿萬國全圖》母本是在南京完成刻板的。

這一切的矛盾,說明鄭和時代製作的世界地圖原藏南京,是所謂利瑪竇

與李之藻等人呈獻的

《坤輿萬國全圖》的前身,

利瑪竇加了一些地名就

成了作者,官員們不但不反對,還樂意促成,爲它

寫序言,把很多本來中國的天文地理知識都算成是利瑪竇帶來的,造成後來大家認爲中國在歐洲人來以前沒有科學。

官員們利用利瑪竇的名字製作地圖,利瑪竇是

他爲什麼不講真相?有幾個可能。第一,他爲了讓官員爲他引見皇帝,必須配合官員的計劃行動。第二,利瑪竇也想把《坤輿萬國全圖》的重要信息保存下來,梵蒂岡現存兩份《坤輿萬國全圖》是他的努力。第三,他不願意因爲泄漏秘密而連累一些官員被殺頭。

利瑪竇保了官員的命,也保存了重要的地圖信息。地圖學“西學東漸”是在皇權和官官時代,無可奈何被逼蒙騙皇帝的計謀。要辯護《坤輿萬國全圖》是利瑪竇製作的,必須解釋上面的懸疑,更重要是爲什麼《坤輿萬國全圖》比所有同時期,甚至200年後的歐洲繪世界地圖都準確、詳細。以上的推理,別想在中國的官方文獻和正史里找到答案。

《坤輿萬國全圖》的秘密保存了600年,欺騙了萬歷,也忽悠了億萬中國人。